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2.014

论《史记》的舆论意识及书写价值

赵子璇

(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叙述中突出民间舆论话语和人物制造、引导舆论的情节。民间舆论话语表现为各种风谣传说和民间领袖的舆论影响;人为舆论制造包括历史人物对自己的舆论包装及其通过舆论引导充当政治领袖,影响历史进程等情节。蕴含其中的舆论意识及其书写不仅在表现社会风貌、饱满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完整着历史叙事,还凸显着广阔历史进程中的人民力量,是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具体表现,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求索。以社会舆论视角观照《史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监督问题,可充分体认史迁的“良史”精神。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舆论;人本主义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K204.2;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2-0092-08

Awareness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Value of Composition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ZHAO Zix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In many of his narratives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ima Qian highlights the discours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reation and direction of public opinion by characters. The discourse of folk opinion is manifested in various folklore and legends and the influence of folk leaders on public opinion; the cre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cludes the packaging of public opinion by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ir acting as political leaders to influence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opinion contained in the book not only completes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erms of expressing the social styles, storylines, and characters,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in the vast historical process. This is another concrete expression of Sima Qian's progressive humanist view of history, which also fully demonstrates his search for the laws of hum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truth and political supervision of the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opinion, we can fully understand his spirit of "good history".

Keywords: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ima Qian; public opinion; Humanistic view of history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叙述其著史之志在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735}。编撰一部“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1]2735}的史籍对于司马迁来说,已成为一种近乎宗教性召唤的神圣事业。然而今人常以史书为工具以明“历史事实”,但若仅限于此,则著者之深切用心不明矣。匪言勿言,有意而言,阅读《史记》,常见诸如“世谓”“天下谓”等话语,表面上看,此是司马迁对当时、当世大众言论的引用,然若展开纵深《史记》阅读,则会发现,许多篇章即便不见

“世谓”“天下谓”等标志性的舆论性词语,也会或多或少地突出民间的舆论态度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而这种舆论意识的书写关系着司马迁对历史中人事盛衰原因的深度思考。由此观之,从史书中明晰人事以资殷鉴应比纠察其中“历史的真相”更具现实意义,对《史记》中舆论意识的探讨也具有了必要性。

一、“舆论”概念与《史记》舆论研究动态

在现代,尤其是在大众传媒空前发达的当代,人们对“舆论”一词并不陌生。舆论研究也是新闻

收稿日期:2022-10-04

作者简介:赵子璇(1997—),女,内蒙古乌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话题。事实上,舆论现象从人类社会一开始便存在,但“舆论”一词出现得较晚。“舆论”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孙权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朗上疏曰……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至大,所致者至细,犹未足以庆。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2]⁴¹²其中,“舆论”指舆人之论,而“舆人”在《辞海》中则有“造车舆的工人”“众人”“古代职位低微的吏卒”这三种解释。典籍中常可见“舆诵”“舆颂”等词,如“访舆诵于群心”^[3]¹⁹⁰⁴“听采舆颂,谋及庶民”^[4]⁶³,皆指众人的言论。“舆”其实还指奴隶,如《左传·昭公七年》中:“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5]¹⁶⁷⁷自王至台共十个等级,皂以下为各级奴隶。由此可知,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舆论”一词指普通百姓的意见和言论,其中也隐含着“底层”“非精英”的义素。

当代学者们对“舆论”所下定义甚多。其中,邹振东在《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一书中对舆论现象作了详尽的逻辑推演,对各种“舆论”定义中的共识与分歧有所判断和分析,最终将舆论定义为“关注的表达与聚集”^[6]²¹。此种定义不仅兼顾了舆论的能量性、公开性和集合性,也中和了不同舆论定义中的分歧。具体来说,舆论的力量是靠关注的聚集形成的,而关注又需要表面上的公开表达。舆论既是一种关注,那么关注可以一致,但意见不一定一致,这解决了不同舆论定义中关于“一致性”问题的分歧。舆论的声音理性与盲动并存,但其常态是中性的,这解决了不同舆论定义中对舆论“正当性”问题的分歧。舆论的主体是关注的制造者,他们用引发关注的方式来制造关注,这解决了不同舆论定义中,人们对舆论主体问题的分歧。“舆论”是“关注的表达与聚焦”这一定义,在众多对“舆论”的概念界定中是较为中肯的,它使人重新审视“舆论”的本质以及舆论影响下的古今社会。

中国古人对舆论的朴素认知中虽隐含着“底层”的义素,但由于“底层”是一个社会金字塔的中下端,其意味着大多数人,大多数人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力量有时是正义的、引领时代的,有时却是盲目的、被裹挟的。自然而然,古人对“关注的表达与聚集”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有着很清晰的认知,这种认知中还携带着一种内在紧张感。如《国语·周语》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

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7]⁹⁹这段话完整地表现了社会舆论的重要性与古代舆论监督对政治发挥作用的大体流程,也告诉我们,古代诗、史等经典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社会舆论的流播存在关系,甚至表现为某种关注的表达与聚焦。诚如《中国传播史论》中所言:“史官记事对人君形成舆论压力,有别于一般的历史记录,而与今之反映民意、掌握舆论监督之报纸有很大的相似之处。”^[8]³⁹然而目前学界对《史记》中舆论意识的发掘、舆论书写价值的探讨却甚为缺乏,大部分研究将《史记》中的部分文本作为可供参考的史料,重点观照的是秦汉时期的舆论形态、传播与社会影响,偏向历史学或传播学研究。专门针对《史记》舆论意识书写展开研究的则仅局限于“民间谣谚”这一种客观表现,除王子今教授的《“谣”“谚”:〈史记〉对民间舆论的关注》,论者寥寥。以下,本文便对《史记》中舆论意识的客观表现与书写价值作整体性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从舆论的角度重新阐释《史记》的历史真实、政治监督问题,以期抛砖引玉。

二、《史记》中舆论意识的客观表现

《史记》中的舆论书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迁重视民间话语的引述或转述,二是史迁在历史叙述中突出人为舆论引导的历史影响力。民间话语包括流播于民间的谣谚传说和乡党父老的言论,但相对于谣谚传说,人们往往忽视了民间领袖的舆论影响力。总体来说,在《史记》的舆论主题中,民间话语还是容易被看到的一部分,它们大多是一些引述和转述,不易被发掘的恰恰是潜藏于历史人物塑造和历史事件叙述中的舆论引导情节,这些情节使《史记》的舆论意识表现得更为清晰和饱满,也更完整地突出了史迁的书写用意。

(一)民间话语

司马贞在《史记索引后序》中讲道:“而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9]⁹司马迁的史学实践很重视民间资料的搜集,常择取民间的传说谣谚加入历史叙事之中。这些“旧俗风谣”作为民间话语,不仅是珍贵的风俗文化史料,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思想道德水平,其作为当时当世许多历史事件“关注的表达与聚集”,也深具社会舆论的性质。这类民间话语作为《史记》中重要的社会舆论表现

之一,通过某种艺术形式反映着具有集合性的社会情绪,其针对的可能是人物,可能是事件,也可能是某种社会现象。

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的宗族、宾客们垄断利益,在颍川横行霸道,针对这些“豪桀大猾”们,颍川郡中流行儿歌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9]2847}显然,颍川百姓对于灌夫以及灌夫周围倚仗权势横行乡里的宗族食客们展现出明确的负面态度,用颍水来比喻灌氏家族,灌氏有如颍水,总有浑浊(灭亡)的一天。类似这样的童谣当然承载着一些社会信息,而这些信息被传播,且在传播过程中形成关注的聚集,关注的聚集又反过来推动着信息的传播,这首《颍川歌》蕴含的深怨讽刺便聚集着社会批判的舆论能量。类似这样的民谣在《史记》中还有很多,如《酷吏列传》里酷吏宁成为政暴戾残酷,民谣刺以“宁见乳虎,无直成之怒”^{[9]3145},《季布栾布列传》中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9]2729},以“诺”闻名关中,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9]1731}《樗里子甘茂列传》中秦人夸赞樗里子:“力则任鄙,智则樗里。”^{[9]2310}无论是讽刺还是夸赞,这些口耳相传下来的谣谚在一定程度上是贴合真实人物的,因为舆论的常态是“中性”的,它能客观反映社会群体对某个人物的褒贬态度,这也有利于读史者把握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

除了对人物的评价,民间对各种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也给予高度关注。如《周本纪》中古公亶父重新治理后稷、公刘的旧业,积德行义,由于不忍战争而带领人民移于岐山脚下定居,“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9]114}。古公亶父在岐下与民众建造城郭、房屋,设立官职,“民皆歌乐之,颂其德”^{[9]114}。《田仲敬完世家》中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9]1883}《曹相国世家》记载萧何去世后,曹参继任相国,与民休憩,执法严明,施政稳定,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颯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9]2031}以上记载清晰地表现了百姓对许多时政事件的正面舆论态度。而在《赵世家》中,公孙杵臼与程婴救下赵氏孤儿,为保赵氏血脉,程婴与公孙杵臼谋划用假婴代替赵孤瞒过屠岸贾,于是程婴背卖友恶名,公孙杵臼牺牲了自己……但经过清人梁玉绳等人考证,这段故事其实出自民间的口耳相传,这段历史传说可以视为政治事件在民间场域中带有舆论性质的传播,其背后隐藏着舆情,司马迁将这段民间史料编进正史,不仅增强了历史的传奇性与悲壮感,还表现了当时人民对于荒

淫无度的君主与大权在握的佞臣的痛恨,反映了负面的舆论态度。武帝时,出身微贱的“讴者”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卫青受封长平侯,且“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列侯”^{[9]1980}。卫皇后姐姐的儿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骠骑将军”^{[9]1980},卫氏家族虽以军功起家,但获得建立功勋的机会依旧来自于卫子夫的受宠,因此“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9]1983}这段歌谣对生男喜、生女怒的重男轻女观念予以表面上的纠正,但“独不见”“霸”字却透露出当时社会对于外戚进身渠道有着偏于负面的舆论话语。就如《佞幸列传》开篇的民谚所说的“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9]3191}。在现实世界中重要的东西,放在舆论世界中未必重要,民众对卫氏家族的赫赫战功有所忽略,却放大了他们“暴发户”式的显贵和表现在外的“裙带关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汉帝国初期的刘邦、张良、萧何、韩信等重要政治人物皆出身寒微的情况下,布衣思想在汉代上层社会中普遍流行,民间社会更不必说,而外戚的显贵与百姓心目中通过自身努力晋身的朴素价值观显然背道而驰,人们对外戚显贵的社会现象施以一定的舆论压力。

所谓“乡土中国”,小农经济支持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建构是以宗法伦理的建构为主线的,父老长辈、豪强游侠们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结方式建构的政治参与方式与精神权威时时刻刻影响着社会与处于社会中的人们。在汉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通过地方权力机关实现多个层面的沟通。一方面,地方权力机关利用像“循吏”这样的地方治理者通过政治思想教化的手段控制、影响基层社会,但另一方面,各种基层力量如宗族父老、士人乡党等的秩序运作形成了强大的民间社会舆论场,影响着民间社会各种事务的决策和评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操纵着舆论,影响着地方权力机关。这种“基层秩序”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史记》中的很多篇章都明显地突出地方舆论权威,其中包括时事政治参与、道德价值评论等诸多内涵。

如《项羽本纪》中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劝项羽东渡以重整旗鼓,但项羽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9]336}在项羽的自白中可以知晓,“江东父兄”作为地方宗族权威,他们的言论在地方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在民间政治传统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项羽兵败后有着强烈的舆论意识,他意识到,如若渡江,江东子弟八千人无一人还

的事实会让自己陷入极为不堪的舆论境地。因为“沉默”是舆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舆论是表达的,沉默相对于表达,但在舆论中,人们却能够用沉默传达态度,所以,“纵彼不言”之下,其实是残忍的舆论真相。反观《高祖本纪》,民间父老的支持对刘邦的最终胜利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父兄们不仅关注时事,还会直接参与到地方政治与建设中,《司马相如列传》中“蜀父老”向司马相如进言曰通西南夷之事不可行,武帝派司马相如入蜀就是为了劝说当地老人们同意通西南夷,在两难之下,司马相如“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9]3048},虽西南夷的开通已成事实,但由此事可知,之于统治阶层,父老们的舆论影响力也是不能够被轻易忽视的。

除了父兄老人们,地方豪杰、贤士也具民间领袖性质,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活动能量。如《张耳陈余列传》中“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9]2573},《白起王翦列传》中,武安君白起蒙冤而死,死而非其罪,于是“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9]2337}。《游侠列传》中,司马迁除了强调“邑中贤豪”“邑中贤大夫”在邑中的调解职能,还叙述郭解入关时,关中贤士豪杰无论认识与否,只要听说过郭解的名声都争相与郭解交往,乡党、父老、豪杰影响下的地方舆论权威由此可见一斑。

(二)舆论引导

舆论具有公开性特质,也就是说,一个舆论的产生需要舆论主体做到表面上的公开表达。《史记》中一些历史人物作的“表面文章”不可被忽略,他们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编造某种谎言或做出某种动作以制造和引导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声音,而这些人为的舆论制造和舆论控制在司马迁的历史叙述中还占据着较大的篇幅。

例如《司马相如列传》中有这样两段描写引人注目,第一段为:

(相如)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9]3000}

临邛令王吉假装礼敬相如,每天都恭恭敬敬去拜访问候,相如起初还礼见王吉,后来便称病不见,但王吉却愈加谨慎恭敬。据余英时先生考证,东汉时,托疾不通宾客为当时士大夫自抬身价之举,王符《潜夫论》卷八《交际》篇就有“所谓恭者,内不敢傲

于世家,外不敢慢于士大夫。见贱如贵,视少如长”之语^{[10]305}。如此可推断,早在西汉,王吉做出此等恭敬的态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散播自己礼贤的好名声,而司马相如此时的称病,乃是士大夫的自抬身价策略。王吉、相如二人利用舆论为自己博取名声,于是卓王孙与程郑两家备办宴席邀请王吉与相如,有意思的是,宴席已开,相如再次说自己身体抱恙不能前来,王吉不见相如,表现更加夸张,竟“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9]3000}。“所有暴露在表面的都是一种表达,都可能是一种舆论”^{[6]105}。王吉与相如种种外在的、表面的动作吸引着人们的关注,他们通过引发关注的方式来制造关注,是舆论的主体。

第二段如下:“相如与(文君)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褌,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9]3000}这段记载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是“令文君当垆”与“涤器于市中”两句,司马相如让文君站在柜台边卖酒是因为女性在舆论场中具有优势,人们更容易同情弱势。穿着犊鼻褌当街洗刷器具也是相如故意为之,因为舆论传播的力量不可小觑,“当街”能引发大众关注度,而“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9]3000}的“家丑”却不可外扬,因此卓王孙“闻而耻之”,甚至“杜门不出”,毕竟在舆论话语中,人之“情”往往高于“理”而居于上风。

又《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塑造了一个善于利用舆论包装自己的刘邦。此篇开篇便记载了一个荒诞不经、极具欺骗性的感生神话,即刘邦的母亲刘媪梦与神遇而生高祖,其后,又是一系列“神化”传言:刘邦在做泗水亭亭长时,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吕公相面后毅然将女儿嫁给他;老父相面后认为刘邦一家有大贵之相,尤其刘邦“贵不可言”;刘邦骊山道上醉中斩蛇,老妪夜哭自述刘邦为赤帝之子,杀了自己的儿子白帝之子;秦始皇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图镇压。刘邦便以为是自己的原因,于是“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9]348},吕后找到刘邦便说其所在之地上有云气,“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9]348}。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叙述这些传说时,特意描写了刘邦的话语与神情反映,如老父相面后,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9]346}听到别人转述老妪之语后,“高祖乃心独喜,自负”^{[9]347}。听到吕后说其所居处有云气后便“心喜”,司马迁固然明白这些故事禁不起推敲,但还是郑重地写在了历史中,他如实地勾勒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舆论意识的政治家形象,而

刘邦作为一位起于民间的皇帝,他必然对民间社会结构与运作具有深刻理解,史迁的人物构造艺术可谓前呼而后应。刘邦还将舆论作为政治工具以图自己政治权力的巩固。他在“天下大定”之后,即令“兵皆罢归家”,^{[9]380}这说明刘邦对将士们在战乱之中渴望归乡的情绪是有切实了解的。此外,高祖荣归故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9]389},免除了丰、沛二县的徭役,除了突显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格局和英雄迟暮的悲怆,也有部分原因是建国初期需要社会舆论倾向。

再如《陈涉世家》,陈胜与吴广作为颇具号召力的意见领袖利用舆论力量起兵,“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皆是为了“威众”,“舆论关注的聚集,可以是关注者主动的作为,也可以是被其他传播主体引发的被动结果”^{[6]20-21}。“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9]1950}。就是陈胜吴广作为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主体引发的被动结果,而历史上人们利用谏语、怪象以获得舆论支持而成为意见领袖的现象其实屡见不鲜。后来,为了扩大影响力,陈胜、吴广利用公子扶苏和将军项燕的声望来获得关注与支持,因为扶苏在百姓心中是国家贤明的接班人,项燕是爱护士卒的好将军,但是,用欺骗制造和引导的舆论环境不会长久,反秦旗帜很快另易他主。

三、《史记》中舆论意识的书写价值

叙述历史就是建构和再现某个时空,在《史记》中,司马迁不吝笔墨地突出社会舆论对人物及历史的重要影响,其深切用心不言而喻。本文将《史记》中舆论书写的价值梳理为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历史叙事,二是突出人民力量。《史记》原始察终,王朝的盛衰兴亡、人物的穷达成败无时不存于众口,通过舆论书写,《史记》能更完整全面地表现历史社会、传达人事之思。

(一)完善历史叙事

《史记》中载录的许多民间谣谚、里巷流言以及制造、引导舆论的故事情节具有完善历史叙事的作用。

首先,这些舆论书写真切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风貌,而这些社会风貌恰恰是历史叙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如《游侠列传》称颂了游侠们“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9]3183}的献身精神,引用鄙人之言如“何知仁义,已飧其利者为有德”^{[9]3182}、“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9]3182}、“人貌荣名,岂有既乎”^{[9]3189},可见民间之于布衣与权贵的态度非

常明朗:百姓看穿了贵族们虚伪的仁义,也道出朴素且直接的道德立场:享受了谁带来的利益,谁就是仁义之人。这种道德立场,深刻体现了当时社会鲜明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价值取向。又如《货殖列传》记载了“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粳”^{[9]3271}、“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9]3256}、“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9]3274},这些歌谣谚语,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各门类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心理与社会习俗的独特风格。再如《淮南衡山列传》,淮南厉王刘长获罪,于流放途中绝食而死,汉文帝由此背上了诛杀手足之名。于是,“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9]3080}表面上看,这首针对社会事件、以民歌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舆论批评是直接指向汉文帝的,但离开历史事件本身,单纯就歌谣来讲,我们发现当时社会的亲族关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汉武帝时期,中央加强了对民间豪强与游侠的打击,可以想见,当时的民间力量或多或少会受到抑制,结合《司马相如列传》中武帝宁舍父老意见而执意开通西南夷之事来看,这件事也切实表现了在大一统基本形成的政治局面下,当时民间父老力量已呈现衰弱态势。此外,前述《外戚列传》中的“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其实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育观念。可见,在舆论的声音中,《史记》对不同时代中社会风貌的展现更加真实和全面。

其次,各种舆论书写使《史记》中的不少篇章情节趋于跌宕、饱满,由此也更能体现史迁叩问人生、探求古今的历史实践精神。很多时候,是里巷流言、邑中评议、人为舆论引导的叙述推动了历史事件的发展,司马迁并没有平面而简单地抄录编排史实,而是将舆论材料恰当合适地放置于历史叙事中,他以独特的史学之策略尽史官之职责。前文已有阐述,民意的聚集未必是正义的,也有可能被利益方操纵,其产生的巨大能量可能会给个人的声誉甚至生命带来影响,甚至扰乱社会秩序。如《孙子吴起列传》里,吴起为鲁国立了战功,却被“鲁人或恶吴起”之人流言加身,说其猜忌残忍、败光家业,于是鲁君在吴起负面舆论的影响下罢吴起官。但从吴起后来在魏国、楚国的表现来看,吴起并非如流言所传那般不堪,反而,他是一个有勇谋、与将士同甘苦、百折不挠、贤明有德的卓越将领形象。史迁在吴起传记开篇便是一笔人为制造的舆论记载,欲扬先抑,通过人言与实际的反差,表现吴起与现

实困境的斗争,表达着世俗环境对个人价值的困厄,史迁认同孔子的述史观:“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9]3297}吴起表现出的人生的悲剧性冲突正是史迁对世俗社会的叩问。

最后,由于历史的主体是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现实的人,更好地表现人物形象就是在完善历史叙事。司马迁在《史记》很多历史故事的叙述中,或将人物置于舆论漩涡中,以动作或语言来表现其性格特征,或从大众舆论话语中侧面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由此,人物形象塑造更加立体,人物性格更加鲜明,不少篇章中更是寄寓着史迁的褒贬之意。《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互读,读者便会察觉,项羽被舆论左右而刘邦始终主导着舆论。刘邦进入咸阳后马上收揽人心,他召集诸位父老,表明自己来到这里是为父老除害,他和父老们“约法三章”,于是咸阳的百姓们争相以吃食慰劳士卒,刘邦却推辞不接受,百姓愈加高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9]362}。刘邦到洛阳,听说义帝被杀,“袒而大哭”并“亲为发丧”,公开表明要为天下共主报仇,将项羽恶行通报诸侯,抢占了舆论先机,为自己的队伍争取到了正义的名分。及至垓下之围,刘邦及一众谋士通过歌谣诱导和舆论操控,深化对方的集体焦虑,取得最终胜利。反观项羽,他带兵西进屠灭咸阳,杀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9]315},又掠夺秦宫中的财宝和妇女,“秦人大失望”,说客劝他关中是建都称霸的好地方,但项羽不听劝,看到秦宫已被烧得残破不堪,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9]315}说客谓项羽沐猴而冠,项羽便烹煮说客,可见,项羽十分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因此,他始终被舆论左右。如此加以对比,可以发现,项羽天真自负,以为凭一己之力便能够夺天下,而刘邦因势利导,善于制造和利用舆论,收拢人心,深知民之所向。二人的处理方式中暗示着他们不同的成长环境,人物形象被塑造得非常成功。又如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以“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这首童谣为证据,武安侯田蚡说灌夫结交奸猾歹徒,欺凌百姓,家产累计达亿万,在颍川横行霸道,欺辱皇室、冒犯皇亲,但田蚡何尝不是“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9]2844}的豪奢骄横之辈呢?然而田蚡被武帝重用,灌夫、魏其侯在恶毒毁谤之辞下被判罪斩首,很显然,有关武安侯田蚡劣迹的舆论声音被压制,言路被封锁,司马迁批判其曰:“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

众庶不载,竟被恶言。”^{[9]2856}在灌夫、窦婴和田蚡之间倾轧斗争的历史舆论“收”与“放”、伪造与隐藏之间,需要良史有辨别地分析判断,求得相对客观的认知,从这方面来说,史迁是值得信任的,其对人物的褒贬中体现了充分的实录精神。

(二)突出人民力量

司马迁始终把“人”看作历史发展的主体,这体现在他开创了因人叙事的纪传体,然而在此基础上更可贵的是,他认识到下层人民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给诸如刺客、游侠、商贾等平民立传,还将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这一体例中,但是,这些人传的人还只是宏阔历史进程中的少数人,历史中更多的是无名之辈、芸芸众生,我们能确切地说史迁没有将目光停留在他们身上吗?《史记》中的各种舆论书写就是在突出那些无名的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力量,舆论书写也是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个具体表现。

首先,自舆论话语中提炼产生的传说与谣谚,通俗易懂却内涵丰富,人民大众从种种社会现象中总结生活智慧,展现出深刻的思想与历久弥新的价值。汪篔先生认为,司马迁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基础上,其著作“必然具有丰富的人民性”^[11],大量引述民间舆论话语,可以说在语言上就深具“人民性”。

其次,司马迁不仅重视来自民间社会的歌谣传说,把它们与严肃郑重的历史记录相结合,更重视基层社会“父老”“乡党”们的话语影响力,还将人为的舆论制造和引导置于历史叙事的重要位置,不论是在一个王朝的历史转折点上,还是重大历史事件发展过程中,抑或是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里,社会舆论都有可能发挥重要的推动力。《史记》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舆论之声,将人民话语重点突出,既生动又不失真实,强有力地表现了人民的力量。

最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反映了广大底层人民的反抗意识,还强调了广开言路、疏通舆论对于一个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例如在《项羽本纪》中,范增游说项梁立楚王聚集人心:“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9]300}关于楚南公,其有可能是楚地的一位阴阳家,也有可能为泛指“南方老人也”^{[9]300}。“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是一首已经流传开来的楚地民谣,带有社会舆论性质,它鲜明地表现出楚地民众在秦王朝沉重压迫下的反抗意识,这种舆论话语反映出的反抗意识是具有推翻一个王朝的力量的,其携带的舆论能量也是

惊人的。当秦始皇游会稽经过浙江,项羽看到后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立刻捂其口曰:“毋妄言,族矣!”^{[9]296}《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坑儒,其中一条理由便是“为妖言以乱黔首”^{[9]258},于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9]255}。及至二世,不说社会舆论,就连公卿大臣们也很少可以进言,可见,秦朝的舆论环境受到严重的打压,也正因此,反秦舆论、反秦行动一直暗流涌动以致一朝爆发。综上观之,史迁治史,对社会舆论、人民声音非常重视,其不仅系于历史之完整展现,还系于人类历史发展之规律,表现出史迁见盛观衰、究天人而通古今的著史精神。

帝王、诸侯、圣贤、领袖人物、重臣、谋臣将相、士大夫这些影响历史走向的人物入史自无需多言,众多商人、游侠、刺客等社会底层人物的入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长久以来的帝王将相历史观,反映出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而《史记》中舆论意识的书写更是将历史中默默无闻的、更广大人民的形象和话语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勾勒、传达了出来,理所当然的,它也是司马迁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个重要具体表现。

在广阔的历史进程中,无名的、地位低微的人民群众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关注的表达与聚集”切实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舆论的能量性、公开性和集合性也决定了那些重视舆论的人将取得事实意义上的胜利。据此,在对司马迁历史观的研究中,应该重视和发掘《史记》中众多舆论意识的书写。

四、余论:《史记》的舆论意识与历史真实、政治监督问题

《史记》“谤书”一案常年聚讼不已,其实这些争执的核心在于《史记》的历史真实与离经叛道问题。若从社会舆论视角切入进行探讨,这些问题其实很容易说明。

首先,著述史书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为支撑,而传说时代的历史缺乏文字记载,先秦文献资料又大量散佚,先天不足。当代之事也并不是每一件都有文字记载,很多人物发迹之前的许多逸闻轶事最初很可能都是通过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尽管有些故事与说法可能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但民众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褒贬、评判是真实的,它也往往比较符合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情况。虽然,舆论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永远是片面的、局部的、有选择性的,但舆论世界又是一个个真

实的关注聚集起来的,无数人的视窗聚集起来,在总体上,就可能反映现实世界。这样一来,舆论世界相当于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它虽非完全等于现实世界,但至少可以反映现实世界。因此,历史真实和社会舆论之间看似是矛盾的、彼此对抗的,但又不自觉地互相成就着。其次,正统思想家们认为《史记》离经叛道,“是非颇谬于经”,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风气下,诸多篇章体现出对统治阶层、掌握话语权的政治主流舆论的背离。但是,“在一个舆论场中,主流舆论是正向舆论,但它不等于正确舆论或正义舆论”^{[6]125},司马迁颠覆了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对历史中的“失败者”给予同情,有时也正侧结合地揭露了事实胜利者的种种劣行,既然“讳”才是“虚假”,那么,“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发挥社会舆论精神,为民执笔的秉笔直书应是“真实”。此外,《史记》某些篇章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舆论世界“弱者优势、情感强势”规律,显示出历史的苍凉悲壮,表现出史迁对历史人物的悲悯共情。因此,在探讨《史记》中的舆论意识时,也应注意到具有舆论精神的《史记》,而由此引发的《史记》与政治监督问题也应被重视起来。

具体来说,政治监督包括制度监督、社会监督等形式,舆论监督属于社会监督,而史论监督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独有的,《史记》便发挥着史论监督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传播现象,而史官凭借一己之力,并不诉诸民意或动员群众,仅通过史家的历史书写就能实现对统治者的威慑和监督,且这种现象只存在于古代中国,因此是一种“中国特色”。此外,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而史论监督的主体是史官,舆论监督是即时性的,而史论监督是历时性的,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而史论监督藏之秘府,从思想来源来看,舆论监督观念背后是现代民主观念的支撑,史论监督背后则是史权天授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支撑。此论述极有参考价值,但本文认为以上观点仍应有所补充:第一,舆论监督并非只是现代社会的政治传播现象,其背后也并非只有现代民主观念作支撑,毫无疑问,在事实层面上,中国古代对民间社会舆论现象是非常重视的。第二,史论监督的主体表面看来是史官,但史官的材料很大一部分来自民间社会舆论和朝堂舆论,因此,史论监督中自有舆论监督的内涵。第三,正是舆论监督的公开性成就了史论监督,因此,史书的政治监督功能发挥作用离不开当时社会的舆论监督。

概之,史官作为类同记者的职业传播者,他需要分辨、择取社会舆论材料,重视民间口述资料的搜集,贴近民间话语,进而秉笔直书,实现对当权者的政治监督。在当代社会,舆论传播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新闻撰稿者则更应该学习史迁的良史精神,以事实为依据,贴近群众并善于聆听群众的声音,能够深入调查,还要具有一定的甄别能力,真正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参考文献:

- [1]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5] 郭丹.左传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邹振东.弱传播舆论世界的哲学[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
- [7] 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
- [8] 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11] 汪钱.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N].人民日报,1955-12-31(3).
- [12] 牟发松.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J].文史哲,2006(6):83-93.
- [13] 鲁西奇.父老:中国古代乡村的“长老”及其权力[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89-101.
- [14] 李东晓,潘祥辉.“史论监督”: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监督机制溯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10):105-125+128.